

·自然辩证法理论·

自然辩证法史上的两桩公案

孙慕天

(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末产生的斯大林模式曾被奉为社会主义的经典样板,这一模式实行思想垄断,根据“左”的方针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与意识形态、与哲学的关系,使苏联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走入歧途,哲学被扭曲为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宗教信条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然科学哲学历史上的这场噩梦是从反机械论和反德波林派开始的。半个世纪过去,这两桩公案已经被淡忘,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仍然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由于我国曾经走过类似的道路,研究自然辩证法史上的这两桩经典案例,澄清历史迷雾,汲取历史教训,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仍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关键词: 机械论;德波林派;斯大林模式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4 - 0001 - 06

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会对科学技术领域带来巨大的冲击,旧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痛苦的立场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如何占领这个阵地,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列宁曾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指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靠思想工作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当他们实际看到无产阶级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这种事业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仅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割断关系。”列宁特别指出:“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1]为此,列宁专门领导了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他们的立场、世界观作了明确的区分。但是,面对当时旧知识分子把持科技战线领导权的局面,急于用那种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行之有效的行政强制手段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在党的骨干和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工作重点主要还是放在组织措施上。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鉴于当时的科学院的领导权把持在旧专家手中,联共(布)中央决定另外成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各建立几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并分别设自然科学部进行领导。两个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主要任务是“在自然科学中,为严格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揭露唯心主义的残余而斗争”。

同时,以这两个部为核心,还建立了十多个赞成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党的立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如“数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协会”、“物理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协会”、“医生马克思主义者协会”等等,并主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面,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刚刚批判过无产阶级文化派不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6 年第 6 期)就旧调重弹,说:“现代的自然科学正如哲学和艺术那样,是一种阶级现象……它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2]

1929 年开始,在自然科学领域自上而下发动了全面的阶级斗争。这是整个形势决定的。这一年是斯大林模式确立的一年,被称作“大转折”时期。从生产力角度说,高速工业化是大转折确定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赖科技进步,依赖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斯大林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了解我国工人阶级的政策,能够领会这个政策并老老实实在地实现这个政策的那种指挥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3]但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旧科技知识分子队伍中,对斯大林模式的支持率很低,而且确实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疑虑和不满的情绪,新的布尔什维克的科技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大转折意味着强化对科学技术领域的行政控制。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指出,大转折对科学的意义在于,“越来越重视科学家的阶级背景,加强对科学

据说当时科学院只有一名共产党员,是个守门人。

【收稿日期】 2003 - 01 - 02

【作者简介】 孙慕天(1940 -),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

工作的计划和控制,科学院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断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讨论和规范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减少苏联科学家对外的出访和交流。^[41]沙赫特事件和工业党事件的发生,正是科技领域矛盾尖锐化的反映。这样的形势,必然反映到哲学思想上来,而在涉及自然科学问题的时候,自然科学哲学必然成为思想斗争的焦点。斯大林在1929年12月9日的秘密谈话中,把自然科学战线列为“重灾区”,在30年代前期掀起了两场大批判,从而揭开了苏联此后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特殊思想史的序幕。

第一次大批判的前期是从围绕机械论的争论开始的。这场争论在2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很长一段事件内,这场争论都是哲学界内部的纯学术争论。机械论派是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科学哲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阿克雪里罗德(Л. И. Аксельрод-Ортодокс)、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И. И.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萨拉比扬诺夫(В. Н. Сарабянов)、季米里亚捷夫(А. К. Тимирязев)、瓦利雅什(А. И. Варьяш)等人。争论是1924年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拉开序幕的。起因是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戈特(Г. Готер)的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该书有斯克切潘诺夫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斯克切潘诺夫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直接了当地说,他赞成这个所谓机械论的自然观,赞成机械主义对自然界的理解。”^[5]他把这篇东西提交季米里亚捷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讨论,该院居然作出决议,一致表示拥护,机械论派声势大振。面对机械论的攻势,德波林(А. М. Деборин)和他的学生们介入了。斯滕(Я. Стэ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斯克切潘诺夫同志是怎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语中迷误的》文章,批评斯克切潘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现代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茫然无知”。^[6]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机械论”为一方,“辩证论”为另一方的局面。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在苏联发表,围绕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理解,分歧更加严重。就在这一年,斯克切潘诺夫发表了《恩格斯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一文,说恩格斯曾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精密科学才能存在;而且认为,恩格斯一生研究自然科学可分为两个阶段,1858-1869年,主张辩证自然观,1873-1882年修正了前期对机械论的看法,认为自然界不是辩证的,而是机械的。德波林随即撰文,题为《恩格斯和辩证法自然观》,予以驳斥,证明恩格斯是一贯反对机械论的。1926年5-6月,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的科学哲学研究所连续召开辩论会,争论十分激烈。1927年,在梅耶霍德剧院又就偶然性的客观性问题举行辩论。辩论中双方各不相让,辩证论者指责机械论放弃辩证法,机械论者指责辩证论放弃唯物主义。1928年斯克切潘诺夫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和德波林学派》,批评德波林信奉活力论,否定现代自然科学成就,否定现代电子和原子核理论。在1929年召开的“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德波林作了题为《讨论会总结》的发言,给机械论定性为“同恩格斯的观点相对立”和“对辩证法抱有轻视态度”。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机械论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改组了它的大本营季米里亚捷夫国

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虽说这一结果已经带有行政干预学术争论的色彩,但到此为止还没有把机械论和政治领域的斗争直接挂上钩。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形势的谈话中,特别点出,“主要危险是机械论者”。斯大林作出这样的估计不是偶然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指出,在哲学、自然科学上,“反对派”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党内的反对派主要是指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一批对斯大林模式持反对意见、而又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他们和哲学上的机械论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布哈林反对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国民经济平衡论。早在1929年12月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就在演讲中,把布哈林的经济理论概括为国民经济平衡论、社会主义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而机械论恰恰主张均衡论,斯克切潘诺夫说:“现代科学一直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的,即把这个充分发展的整个世界解释为均衡”。^[7]于是,布哈林就成了机械论的领军人物。在1930年红色教授学院关于哲学战线的头两个决议——《哲学战线的状况》(1930年8月2日发表)和《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问题》(1930年10月4日通过)中,虽然强调:“机械论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因为机械论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论”,但还没有把它和党内反对派联系起来。而在斯大林谈话后通过的第三个决议——《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前任务》(1931年1月26日发表)中,却指名道姓地说:“在现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仍然是机械论式的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佩罗夫、瓦利雅斯、萨拉比扬诺夫、季米里亚捷夫、阿克雪里罗德等同志)和波格丹诺夫的机械论式的修正历史唯物主义(布哈林等人)”。并明确把反机械论的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将其和对待斯大林模式的态度直接联系起来:“这种修正基本上是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富农代理人的理论基础,因为这种修正在改造时期和全面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条件下具有国内深刻的社会根源。”^[8]此后,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哲学上持异见的学者变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厄运从此开始,如瓦利雅斯等人均遭逮捕,并被处死。

还在1962年,苏联就已有学者实事求是地指出,机械论“并没有成为一个有共同政治基础和统一理论纲领的学派”。^[9]其实,机械论不过是在20年代的一段时期出现的、主要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表现出较为一致的看法,一种哲学思潮而已。持机械论观点的学者们,无论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就政治立场说,斯克切潘诺夫是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参加俄共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而阿克雪里罗德则是著名的孟什维克分子;季米里亚捷夫是物理学家,主要兴趣是自然科学哲学;斯克切潘诺夫最关心的是一般哲学问题;阿克雪里罗德和萨拉比亚诺夫却热心于认识论的研究。

说到对机械论的评价,在斯大林时期一直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直到1955年罗森塔尔(М. Розенталь)和尤金(П. Юдин)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还说:“机械论哲学和它的‘均衡论’、‘自流论’等等被列宁主义的敌人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等用来反对共产党的路线。”^[10]我国早在20世纪

30年代就按照这种观点介绍过当时苏联对机械论的批判。此后就基本上没有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只是80年代中叶,有人撰文重新评价这桩历史公案,对机械论的认识论观点做了全面分析,既指出其错误,也公正地肯定了他们在理论上正确的、有启发性的创见。但遗憾的是未对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做专门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对机械论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例如1985年出版的叶夫格拉夫(Ф.Е.Евграфов)的《苏联哲学史》就认为:“这一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忠诚信奉者,尽管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往往不准确”^[11]。总的说来,20年代苏联的机械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确实并没有真正掌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而且对最新自然科学革命的成果所作的哲学概括也有很多是错误的。1983年苏联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中的“机械论”条目指出,机械论者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的主张是:“用现代自然科学结论代替哲学,把高级物质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的、物理-化学的相互作用,用‘均衡论’取代辩证法,否定偶然性的客观性。”^[12]这一评价是有一定根据的。机械论确实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认为科学本身就是哲学,如斯切潘诺夫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存在脱离和独立于科学的、具有某种特殊‘专门研究方法’的某种‘哲学化’的部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唯物主义哲学就是现代科学最新的和最普遍的结论。”^[13]机械论者一般都拥护还原论,认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可以归结为机械的或物理-化学运动。在他们的文集《自然界的辩证法》中,明确写道:“是否必须承认,存在着那样一些现象或变化状态,它们不完全是机械位移或者包含某种机械位移以外的东西?我们断言,这样的斗争观不是唯物主义的……在辩证法的结点上,物质过程除了多样化的形式和主体在时空中位移之外一无所有。”^[14]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也并不能因此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斯切潘诺夫从机械论立场出发,竟认为恩格斯这一重要论断是不了解现代自然科学,是错误的。所有这些方面,不仅与辩证法南辕北辙,而且表现出机械论哲学的幼稚性。不过,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在苏联传播的时候,出现对自然辩证法以及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机械论误读,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成熟的表现,当然也不排除资产阶级哲学文化的影响(例如当时在西方盛行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把对机械论的批判引向政治斗争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机械论是在斯大林模式极“左”路线下面的第一个牺牲羔羊,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在反对机械论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德波林派,很快就被推到审判台上。反德波林派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哲学领域的第二次大批判。德波林学派是2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学派,其主要成员除德波林外,还有

卡列夫(Н.А.Карев)、斯滕、阿果尔(И.Арол)、列文(М.Л.Левин)、列维特(С.Г.Левит)、格森(Б.Гессен)等。还在20年代初期,德波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任哲学教授,指导一批学生攻读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大师的著作。这些学生后来聚集在德波林周围,从事哲学工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立场和观点。德波林1926年主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许多德波林学派的成员参加领导工作;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所长是德波林,卡列夫、斯滕等也参与领导;而负责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领导工作的也是德波林派的列文、列维特、阿果尔等人。所以,当时他们被称作“哲学领导”。1929年,德波林在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德波林派成了批判机械论的英雄,于是德波林派控制了国家出版局哲学部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哲学组,机械论者季米里亚捷夫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院也被改组,领导换成德波林派的阿果尔。

但是好景不长。如斯大林说,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为了确立斯大林模式,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思想阵地上的旧权威(即使他们确实愿意或者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宣战。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出信号说:“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成就,我们实际工作的成就与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15]有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人,已经从中嗅出了未来理论思想的指向,他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理论落后于实际,那么在哲学权威德波林领导下的苏联哲学界落后不落后呢?时势造英雄,有人起而发难了,其代表就是工人出身、年方29岁刚刚留校的哲学教员米丁(М.Б.Митин)。还在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发表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的前半年,米丁就带头和另外两位青年哲学工作者撰文《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炮打德波林派,专门就他们的得意之笔——反机械论中的错误开刀,说他们是用形式主义的唯心主义代替辩证法,指责他们标榜哲学的“独特性”,逃避现实性和党性。文章点了德波林派的干将卡列夫和斯滕的名字,实际上是直指德波林本人。此文登在1930年6月7日《真理报》上,党的机关报编者特地在文后加注:“编辑部同意本文的基本论点”^[16],这很不寻常,说明米丁确实摸准了政治行情。在这样的形势下,首先是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内部,对德波林的批判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应当说,在最初阶段,这一批判虽然得到官方的支持,但仍然属于自发的性质。开始时,理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限于哲学观点上,德波林派可以自由地抗辩,对这一学派的观点也可以公开表示同情。1930年7月,以德波林为首的10名该派成员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五期上,联名发表题为《关于哲学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对米丁等进行反批评。1930年8月2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通过《哲学

如张如心:《苏俄哲学潮流概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沈志远:“苏俄哲学思想之检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8月创刊号;沈志远:《近代哲学批判》,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

李昭时:“苏联机械论认识论观点试评”,《外国哲学》,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

战线的状况》的决议;不久,又于10月14日通过第二个决议——《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问题》。^[17]两个决议都肯定了哲学战线的巨大成就,批评的调子基本上是定位在学术观点上,重点是指出哲学研究脱离实际,对列宁哲学遗产估计不足,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不力。直到1930年10月17-19日召开的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学院领导米留京(В.П.Милютин)作了主题发言,对德波林派基本上还是从哲学理论错误的角度定性的,主要是批评德波林贬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地位,对待辩证法的理解是“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论”,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唯物辩证法,没有从哲学方法论上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等等。米留京还特地声明:“我无论如何都无意谴责哲学领导同情右倾立场”,认为他们没有对右倾派别作出哲学研究仅仅是由于“理论和实践、哲学和具体现实之间的割裂”。而在补充发言中,德波林为自己作了长篇抗辩,甚至倒打一耙,说:“我应该说,米留京的报告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最明显的例子。”而这话居然赢得了掌声。他为自己逐条辩解,在场的许多人明显倾向于他,米留京甚至显得有些被动。^[18]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专程到红色教授学院与支部委员会成员谈话,亲自给德波林派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后面这顶帽子从此就成为德波林派的政治定语。米丁后来在回顾斯大林的秘密谈话时说:“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德波林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并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修正下了个著名的定义,即这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修正。”^[19]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以米丁为首的激进派抛开哲学理论的讨论,直接着眼于政治斗争,把问题定位在对待“大转变”的态度,即对待斯大林模式的态度上。还在斯大林秘密讲话之前,他就“先知先觉”地指出,德波林“完全不了解转变的必要性、实质、性质和任务。”^[20]在斯大林秘密谈话后,米丁则攻击德波林派是伪装得“十分狡猾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它们企图采取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方式,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21]1931年1月26日通过了红色教授学院的第三个决议——《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前任务》,总的结论是:“德波林集团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全部综合实际上按其本质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是以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的,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周围的敌对的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22]就在这个决议通过的前一天,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改组了编辑部,紧接着又作出《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的决议》,改组了苏联哲学界的领导,德波林派完全失势。以后的20多年间,对德波林派的定性越来越严厉,从“托洛茨基的代理人”,直到“人民的敌人”。德波林本人做了检查,得以免受缙绅之苦,而其他入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像卡列夫、格森等人都遭迫害致死。斯滕虽是斯大林的哲学老师,也未能幸免于难。

德波林本人并不专门致力于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但他

经常涉足这一领域,他的学派中则有一些造诣颇深的自然科学专家,如物理学家格森,生物学家阿果尔、列文、列维特等人,他们中有的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而且像格森还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有世界影响的成就。德波林派的自然科学哲学思想当然是这次思想斗争的重要内容。在斯大林秘密谈话前红色教授学院通过的两个关于哲学战线的决议中,已经把德波林派和机械论派相提并论,指出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犯了一系列错误”。第一个决议笼统地指责德波林派“过分迷恋资产阶级理论”。^[23]第二个决议则具体罗列了这些错误,并且点了名。决议指出,第一个错误是他们“非批判地”对待“唯心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第二个错误是德波林派的自然科学家本身发生了“唯心主义的动摇”,如指责列维特把恩格斯和拉马克混为一谈,把西方遗传学混同于唯物辩证法等。决议因此提出:“我们面临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整个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任务,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改造整个科学的任务。”^[24]

斯大林秘密谈话后,这样轻描淡写地批评显然不行了。1930年12月23日-1931年1月6日,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了主题为“自然科学战线的转折”专门会议,这显然是响应斯大林的讲话,跟上“大转变”的形势。会上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部的负责人施米特(О.Ю.Шмит)主讲,马克西莫夫(А.А.Максимов)补充发言。施米特是有成就的实证科学家,他关于太阳系中天体起源的假说在天文学界是有国际影响的,在处理自然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比较敢于坚持科学独立性的原则。1926年,面对有人侈谈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时候,他却唱反调说:“西方的科学并不是清一色的。不分青红皂白地在西方的科学上贴上‘资产阶级’或是‘唯心主义’的标签,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25]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是专搞科学史和自然科学哲学的,此后似乎长期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斯大林学者的代表。施米特的发言非常有特点。第一,他把“大转变”时期,理解为“赶超”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整个经济重组”的时期,回避斯大林半个月前刚刚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只用一句“阶级斗争激化”一带而过),甚至只字不提斯大林。第二,他认为自然科学战线的主要问题是:“几乎完全没有充分制定的、详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理论正在成为阻碍实现这个‘赶超’号召、阻碍我们前进的瓶颈之一”。他从理论上分析了当时自然科学战线上的三个派别,认为一派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上有些贬低了哲学的作用”;一派是机械论者;一派是正在遭到尖锐批评的德波林派的科学家们。他认为自己属于头一派。施米特没有把这些派别和反对党的总路线以及政治立场的反动联系起来,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哲学立场不正确”,“我们的工作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封闭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中”,“组织的软弱和干部的不足”。第三,一再肯定近几年自然科学战线的成绩,并把1929年4月的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术机关会议说成是这时期工作的“极点”。^[26]

施米特在和马克西莫夫辩论时,说他用的是天文学词汇:anoreia(apogee),最高点或极点。

马克西莫夫当即针锋相对地作了发言。首先,他突出了“大转变”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本质,特别援引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当前理论落后于实际的错误是“同敌视工人阶级的派别紧密相关的”,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就是和“敌视无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派别紧密相关”。其次,他认为德波林派的哲学领导错误的实质是“对敌对意识形态的调和态度”,是“唯心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而该派在自然科学战线的领导积极支持哲学领导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完全偏离了党的总路线。他历数了德波林派自然科学领导的罪状,指责他们把资产阶级科学家的理论同辩证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批评格森把爱因斯坦相对论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化,把物质说成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指责列文、列维特和阿果尔用西方有反动倾向的遗传学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并举出阿果尔关于“身体只是性细胞的储藏盒”的观点和谢列布罗夫斯基(А.С. Сребровский)关于“增加基因储备能在两年半内实现五年计划”的“谬论”为例。最后,他不同意施米特对近年来自然科学战线形势的估计,认为施米特所说的“极点”不是“党的真正评价”,只是他自己的“主观感受”。^[27]

施米特的做法无疑是螳臂当车。不到一个月,红色教授学院就于1931年1月26日作出了第三个决议,说施米特“对德波林集团持调和态度,实质上是保护德波林集团”。对德波林派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错误进行清算是这个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议把哲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概括为五大问题,其中涉及自然科学的就有两个:一是“关于哲学、自然科学和一般地说整个理论的党性”,二是“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广泛展开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性”。决议的第13条专门揭露自然科学领域德波林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列举的罪状有11条之多,主要有:不问政治,歪曲斯大林有关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指示;忽视列宁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混淆具体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等等,还具体指出了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和医学的问题。^[28]由于1930年2月23日召开的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会议没有解决问题,自然科学部的主要负责人施米特公然持对立态度,联共(布)中央不得不直接插手,于1931年3月15日专门作出联共(布)中央《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的决议》,严厉指出:“建议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特别注意自然科学部的全部工作的迫切的政治重要性”^[29]。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随即召开有该院自然科学部和红色教授学院自然科学部参加的扩大会议,重新审议上次会议上施米特的主题报告和马克西莫夫的补充报告,作出了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

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还是对整个科学哲学,这个决议都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本,因为它是政治霸权话语肆意干预自然科学独立性的典型范例。决议一开始就把自然科学纳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范畴,说:“这个改造也应该扩展到技术、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中”;还特地指出,要改造的不仅是“科学组织的形式”,而且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改造它的内容本身”(着重是我加的——作者)。决议分析了自然科学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从国际讲到国内。国际上,除了列举相对论的

马赫主义、波动力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等等之外,还强调指出“许多专门的自然科学哲学讲座宣传敌视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说”,特别点了莱欣巴赫(H. Reichenbach)和石里克(M. Schlick)的名。国内则指出敌对势力从两个方向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进攻,一是公开的破坏,一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对于后者,在一般地列举了已经揭露出来的“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倾向和机械论之后,重点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导集团的德波林派思想倾向,主要罪名是:曲解科学中的党性原则,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把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主要例证是格森把相对论的时空观混同为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列维特把现代遗传学混同于马克思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著作对自然科学的意义;理论脱离实际,用“非正统的”的马克思主义同机械论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决议认为,自然科学战线上这些问题的性质是:“实质上表现了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压力”,而对自然科学战线形势的估计是:“自然科学战线,是理论战线上最落后的、最缺乏马克思主义干部的一个方面。因此自然科学战线目前的状况比哲学战线尤为严重。”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决议提出的改进措施的要点是强化思想垄断和彻底改组领导机构,基本原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为党的总路线进行经常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决议规定,今后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对苏联各主管部门的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实行方法论的监督”,这就是说,这个组织将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稽查队。^[30]

反德波林派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这件事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毛泽东当时关心的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所以他说:“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31]其实,至少就当时苏联党内高层决策集团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且不说德波林派在哲学上有哪些具体错误,问题是他们是一批独立思想者,企图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诠释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种独立思考必然会对党的中心工作产生负面干扰,姑不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即使对正确的路线出现的干扰,只要是属于思想领域的问题,就有一个以什么方式排除这种干扰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列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针,反德波林派表明,苏联从那时起,在学术思想领域(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完全放弃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这一模式就是高度的思想垄断,学术问题政治化,用行政手段裁决包括自然科学问题在内的学术是非。应当指出,这不是一个手段的选择问题,而是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质的问题,扭曲了这个性质,也许会达到暂时的功利目标,但其代价却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断裂,从而导致社会动力机制失灵,造成体制性危机。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应当谈一下德波林派的自然科学哲学观点。在反机械论的斗争中,德波林派坚持了辩证法的运动观,批判了还原论,论证了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质变、飞跃和突现的辩证法。同时,德波林派反对把哲学等同于实证

科学,坚持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这些,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然而正是在理解哲学的指导作用上,德波林派犯了他们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的最大错误。与他们所推崇的普列汉诺夫一样,德波林派不理解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本性。德波林说:“辩证法是与认识论相对立的方法论。”^[32]这是德波林的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他看来,辩证法既然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它就是超越认识的本体论原则。还在1909年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他就把“外部世界”说成是“有规律性的原则”,列宁说这是一个“拙劣而又荒诞的字眼”^[33]。但是,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才把辩证法看成一种先验的原则,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对经验的系统化唯一有用的工具”。这样,他就和黑格尔一样,用自然哲学的态度处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德波林极力主张用唯物辩证法改造自然科学,并把这一主张强加给恩格斯,硬说恩格斯“力图尽可能完全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理论,从辩证法观点出发改造自然科学”;^[34]在德波林看来,不是像恩格斯说的那样,辩证法应当适应自然科学的每一个进步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而是相反,自然科学必须按照辩证法的要求来全面进行改造,他的说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普遍的方法论,应当贯穿于一切具体的和经验的科学,因为它可以说是科学的‘代数学’,把内部的联系带进到具体的内容中去。”^[35]他完全把原则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像波粒二象性这样的自然科学规律都包含在辩证法中,因此说,“于是,辩证法就在最重要的地方预料到了最新物理学的成果”^[36]。德波林对自然科学哲学的性质和功能认识,是复活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倒退行为,是把辩证法看作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其实,当时对德波林派大兴问罪之师的米丁等人,就哲学立场说,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对德波林派的批判恰恰“忽略”了这个角度,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从后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发展看,这种以哲学思辨置换和裁决实证科学研究的“代替论”倾向,正好为推行思想垄断服务,因此愈演愈烈,直到60年代才受到挑战。一般说来,这是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的历史弱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个有着70年宣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历史的国家,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在那块土地上,这段历史已经结束,但是它不应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因为从很多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这一历史的继承人。

【参 考 文 献】

- [1]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A].列宁选集(第3卷)[M].785-786.
- [2][25]转引自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工作的一些历史情况和经验[M].石家庄:河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18.
- [3]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建设任务[A].斯大林全集(第13卷)[M].61.
- [4]Mark Adams, Science, Ideology and Structure: The Koltsov Institute 1900 - 1970. In Linda L. Lubrano and Susan Gross Solomon, The Social Context of Soviet Science. Vm. Dawson and Sons, Ltd. Cannon House, Folke-

stone, 1980, pp. 183 - 184.

- [5][6]Большевик 1924, №1. С116., С86.
- [7]Там же №15 - 16. С116. (中译文参见张念丰,郭燕顺编.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459.)
- [8][23][30]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前任务[A].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114、87、127.
- [9]И.С.Нарский и Л.Н.Суворов, Позитивизм и мех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из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Изд.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1962. С52 - 53.
- [10]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S].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86.
- [11]Ф.Е.叶夫格拉夫.苏联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98.15 - 16.
- [12]Философ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1983. С368.
- [13][14]Цит. И.С.Нарский, Л.Н.Суворов, Позитивизм и мех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изия марксизма С56,63 - 64.
- [15]斯大林.论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A].斯大林全集.(第12卷)[M].126.
- [16][17][18]张念丰等编.德波林派资料选编[M].206,108,113,83 - 105.
- [19]Доклад В.П.Милютин и Содрклад А.М.Деболина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 1991. №5. СС119 - 155.
- [20][22]米丁.哲学战线的初步总结与任务[A].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123,122.
- [21]米丁.我们的哲学分歧[A].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243.
- [23]哲学战线的状况[A].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
- [24]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问题[A].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
- [26]О положение на фронте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Доклад О.Ю.Шмита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 1991. №9. СС137 - 142.
- [27]О Положении на фронт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Содрклад А.А.Максимова Там же СС142 - 149.
- [28]联共(布)中央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的决议[A].龚育之,柳树滋编.历史的足迹[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4.
- [29]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31. №0. 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A].参见龚育之,柳树滋编.历史的足迹[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5 - 127.
- [31]毛泽东.矛盾论[A].毛泽东选集(第1卷)[M].299.
- [32]А.М.Деборин, Философия и марксизм М - Л1930. С259.
- [33]列宁.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批注[A].列宁全集(第38卷)[M].544.
- [34]А.М.Деборин,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Воинствующ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1925. №5. С17.
- [35]转引自米丁.辩证法唯物论[A].513.见张念丰等.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M].44.
- [36]А.М.Деборин, Ленин и кризис новейшей физики Л - М1930. С19.

(责任编辑 郭晋风)